

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及其影響

葉陽明

前言

主導人類行爲的思想與政治和社會發展之間存有密切的交互影響關係。政治社會的環境可孕育或激發某種思想及理念，並提供給此種思想體系一活動空間，在其中思想發揮實際主宰人類行爲的作用。從相對角度觀之，思想及行爲在產生相當的影響力之下將多少改變政治社會的現狀，且進而導致新環境的形成。思想與政治社會兩者間的互動關係是沒有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性；古今中外皆可發現此一關聯性。

國內學術界近年來對西方哲學、政治和社會思想家的研討頗具成果。然依筆者觀之，研討的對象及深度似嫌偏倚和不足。造成如此現象之主要原因有二：一則學者依其主觀認定的重要性等級以擇取研討的對象（思想家）；另則第一手參考資料欠缺、且第二外國語——即除英語以外的外國語文如德、法、西班牙、俄語等——語言能力有限、應用困難。

筆者有感於國內學界對近代歐洲國家若干重要思想家的探討有所忽略，而諸此思想家之思想理念又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造成相當之影響，故擇取德國歷史、文化哲學家暨政治思想家——史賓格勒·歐斯華德（Spengler, Oswald）——做爲研討的對象。由於史賓格勒在歷史及文化哲學方面的觀點頗爲精深抽象，且涉及範圍廣泛，不宜於此以該主題來討論之，因此筆者在有限的篇幅裏僅就史氏思想體系中屬於政治的面向進行重點式的探討。

全文由四部份構成：首先簡述史賓格勒的生平事蹟；其次扼要說明史氏的歷史和文化哲學觀之要義，因爲其哲學與政治思想間實有密不可分之關聯性；第三部份係全文的核心所在，試圖深入研討史氏的政治思想及國家理念。在探討時亦顧及政治思想形成之特殊背景因素；最後欲就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對近代，甚至現代德國政治與社會之影響予以評估。

至於本文撰寫之參考資料則以史氏之政治性論著爲主，而同時以德國及瑞士政治學者之相關專著爲輔，皆係德文原文資料。

壹、史賓格勒·歐斯華德之生平簡述

德國歷史文化哲學家暨政治思想家——史賓格勒於一八八〇年九月誕生在德國哈爾茲 (Harz) 的布朗肯堡 (Blankenburg)。史賓格勒的祖父任礦場督察，父親則任郵政高等秘書職。一八九九年史氏完成中學學業。隨後若干年中，他分別攻讀自然科學於慕尼黑 (一九〇一年)、柏林 (一九〇二年) 及哈樂 (Halle 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在二度參加口試後，史氏獲哈樂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以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 生於西元前五百多年) 之思想為主題。同年底，史氏參加物理、化學及數學等科目的國家考試。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史氏分別旅居於薩爾布律肯 (Saarbrücken) 和杜塞朵夫 (Düsseldorf)。其後，他前往漢堡，任教於一所中學。這所名為「亨利赫爾茲 (Heinrich-Hertz)」的中學至今依然存在。

為進行個人研究和著述計劃，史賓格勒於一九一〇年毅然辭去中學裏教學的工作。翌年，史氏徙居慕尼黑，因為他無法忍受在漢堡令人頭痛異常的氣候。史氏在慕市潛心從事於藝術史、歷史、哲學及政治的研究，却不知諸此廣泛之研讀將會導致何種之結果。一九一二年，史氏偶然在一書局櫥窗中發現了一本由奧圖塞克 (Otto Seeck) 所寫的論古典世界之沒落史的書。該書引發史賓格勒的靈感，他遂為進行中的著述 (後世舉世聞名的巨著) 命名為西方之沒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正如史氏的姪女孔哈蒂 (Dr. Kornhardt) 所言：史氏在偶然中定名的書未料日後竟具有啓示錄般的意味。

西方之沒落一書的上冊已於一九一四年完稿，三年後準備付印。然而由於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時局艱困，故延至一九一八年始先後於維也納及德國出版。據悉，史賓格勒並未服兵役。大戰期間，史氏經濟狀況極為窘困；在微弱的燭光下，於簡陋的住宅裏，他完成畢生首部著作。西方之沒落一書的下冊內容蓋定稿於一九一七年，但亦遲至一九二二年四月纔印。該書上冊頭版又經史氏一度的修訂，於一九二一年初售罄。兩年後上冊以它種形式再版，其基本思想並未改變。

史賓格勒的首部有關政治的著述是普魯士之特質與社會主義 (*Preußentum und Sozialismus*)。該書係史氏受友人艾伯斯 (August Albers) 之激勵而完成，並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出版。書中之立論頗富鼓吹性及煽動性，內容反映出史氏特有的政治觀。

直至一九二五年，史賓格勒亦獻身於政治性活動。從一九二〇至二五年間史氏熱衷於新聞業的組織問題，尤其是對外政策方面的消息社之組織及國外有關德國國情的消息之組織。除此以外，史氏又致力喚醒德國青少年的政治意識。這五年當中，史氏更旅遊各國 (如：義大利、法國及東歐諸國)，並做過多次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演說。

吾人不可將史賓格勒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間的作為以偏概全地視為是單方面的政治活動。史氏於一九二二年前後還撰

成世界歷史之形態學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一書的下冊。該冊係探討一般政治和哲學的問題。此外，史氏在上冊完成後即已著手撰寫人類自起源始之歷史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von Seinem Ursprung an*) 一書。

一九二五年後，為顧及虛弱的身體健康狀況，史賓格勒遂中止其政治性的活動。但是，吾人從往後幾年裏史氏所發表的演說和論文中仍可感受到濃厚的政治宣傳性（譬如：「論德意志民族特色」、「當前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之關係」、「危難中之德國」）。惡劣的健康狀況總是予史氏的生活以莫大的限制。一九三一年，史賓格勒於「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館」年會上發表演講，講題為：「人類與技術 (*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正如史氏在開場白時所說的，該講稿乃他所著的人類自起源始之歷史一書的部份節錄。這部書內容極為廣泛，然未曾寫完，故頗遺憾。

一九三三年史賓格勒的另一部政論性的著作決定年 (*Jahre der Entscheidung*) 出版。同時，史氏對現實政治的興趣又復活。他與政界人物的交往亦恢復。不幸地，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統治之下，史氏的政治活動幾告停止。史氏的論著必須接受「國家社會主義黨中央宣傳部」的檢查。史賓格勒畢生最後一部公開發行的決定年一書有一副標題：德國與世界史之發展，他在書中亦註明曰：本書內容僅係一套規模更巨的著作的第一部份。此種聲明顯然有耐人尋味之意。當時就有若干對此聲明不同的猜測。無疑地，決定年一書的其餘部份畢竟未能問世。史氏本欲在該書首度出版後即赴國外旅行，然顧及出書後可能得為本身的言論負責，故決定暫時留居德國，而將行程延後數日。

史賓格勒於其晚年曾透過中間人的介紹而與當權派——「國家社會主義黨」——領袖希特勒結識。至於史氏在納粹政權（國社黨之統治體系）統治下的生活情形則不得其詳。彼時，史氏無其它政治性的論著出版。他最後公開發表的言論是一篇透過電文對「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問題之答覆。該文以英文發表。

史賓格勒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的深夜因心臟病突發而在慕尼黑逝世，享年五十有六。外間謠傳史氏死因係自盡絕非符實。

史氏過世後，其姪女又陸續於一九三八及四一年將其思想論叢整理成集冊，並付之出版。①史實顯示，這一代哲人的思想和言論對近代德國的政治與社會有深遠之影響。

貳、史賓格勒之歷史哲學及文化哲學觀之要義

正如瑞士政治學者施杜茨 (Ernst Stutz) 在其博士論文政治思想家——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als Politische r*

註① 參閱 Ernst Stutz, *Oswald Spengler als Politischer Denker*, Bern 1958, 頁 1140~1143。及德國 BROCKHAUS 百科全書第十七冊，頁 70 八一九。

Denker)一文前言中所指出的，史賓格勒的哲學與政治論著間存在著一種「內部統一性」。基此大前提，史氏的哲學與政治觀是交互關涉的：意即，在其政治論點內蘊含著一種哲學思想；而在其歷史哲學思想中襯托出特種政治理念。②兩者交織成一體、構成了史賓格勒的整個思想體系。吾人在探索史氏政治思想之前，理應先討論那孕育於其中的哲學觀，俾自成一貫之脈絡。

最能充分反映史賓格勒之歷史哲學與文化哲學思想者無疑是史氏畢生的代表作——西方之沒落一書。該書以極深奧的哲理刻畫出現代世界歷史之形象。③在它的上冊緒言開端，史氏開宗明義的指出：「本冊中敢於首度做一預先決定歷史的嘗試。它試圖在未屆期的階段中追跡一種獨有的——當今於此地球上被理解為處於完結中的——文化（即西歐、美國文化）之命運」。④吾人由以上語句裏不難得知，史氏欲從哲學角度來從事世界史的定形工作，並預斷西方文化之命運。

史賓格勒秉持其前人賀德(J. G. Herder)、布克哈特(J. Burckhardt)及郎蒲瑞希(K. Lamprecht)諸學者所提出的「文化循環論」。在文化循環論的理念架構下，史氏研究發展出一套普遍性的世界歷史之形態學(*die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⑤「形態學」之概念起源於自然科學範疇：生物學中的形態學意指「決定形態(或現象)及其發展之法則學」。史氏延伸生物學的概念，而將形態學轉借應用於世界史方面的研究上。進一步而言，他借用生物學的固有概念——「同類學和類比學」，在人類歷史活動的範圍內透過種類與種類之間的相互詳實比較，以發掘文化及其發展的特色之結構形態。⑥

史賓格勒將「文化」理解為「巨型有機體」。史氏在世界歷史之形態學理念中亦深入描述世界各種文化及其生存風格的形態變遷。文化演進和變遷的過程由三階段所決定：鼎盛期、成熟期、沒落期。任何種文化皆無例外地必經該三個階段，此即史氏所謂的「必然性之決定論」。諸文化發展的相同性(必經前述三階段)使得人們能夠對比各不同種文化在同一時期(或階段)的結構。基於如此觀點，史氏試圖將其自身所處的時期(廿世紀上半葉)之文化狀態與往昔「羅馬帝國」晚期之文化狀態做一番相對的類比。⑦他欲藉此嘗試來證明本身觀點的可行性。

然自另一方面言，史賓格勒却把結構類比學之方法置於一旁，而依文化與文化間在形態上相互孤立的理論提出了一套「極端性之多元論」。依該論點，史氏否認文化間相互關係的可能性，對所謂的「文化一般規範性」則持懷疑的相對論。⑧

註② 參見E. Stutz, 前揭書, 引言部份。

註③ BROCKHAUS 百科全書, 前引冊, 頁七〇八。

註④ 節錄自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Erster Band, München 1923, 頁III。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參閱Ernst Stutz, 前揭書, 頁二一。

註⑦ 參閱 BROCKHAUS 百科全書, 前引冊, 頁七〇八~九。

註⑧ 同註⑦, 頁七〇九。

史賓格勒又反對「直線式之歷史理論」。該理論主張：西方文化乃古代文化之承繼者。史氏將人類史的文化區分為八種：一、埃及文化、二、巴比倫文化、三、印度文化、四、中國文化、五、古典文化（自基督誕生前一千一百年起）、六、阿拉伯文化、七、西方文化（自西元九百年起）、八、墨西哥文化。^⑩史氏把前述每種文化的成就解釋為該文化在相當時期內「心靈狀態之表徵」。在與其它諸文化的相當時期（階段）對比之下，史賓格勒描述西方當代適值「文明之沒落期」。此種沒落並非意謂災難式的淪沒，而是文化創造力的消失。被理解為趨向沒落的西方當代喪失了哲學與藝術上的塑造力。其哲學和藝術淪為「講壇上的空洞哲理」及「工商性的通俗藝術」。西方當代之特徵顯示於工藝技術所主宰的大眾之中。^⑪

對西方未來的政治發展，史氏預估若干可憂的現象，如：毀滅性之戰爭、帝國主義、專制政治、政治形態之益趨原始化。引人注意者，史氏認為俄國文化正興起，它將在未來取代西方文化。

具體而言，史賓格勒的歷史哲學及文化哲學觀係以當代生命哲學之生物學概念為基本前提，並明顯地關涉到德國近代著名哲學家尼采·腓特烈（Friedrich Nietzsche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年）及著名文學家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年）的相關思想。依彼等之見，精神非一獨立自存體，而是一般宇宙成長與沒落法則的功能結合器。此外，史賓格勒本其生物學及社會學觀點還認為，「為求生存而鬪爭」的行為在歷史中扮演一核心之角色。人類發展技術，俾在生存的鬪爭中取得勝利。^⑫

史賓格勒哲學思想中的「生存鬪爭論」實可做為吾人理解史氏政治思想領域裏的「強權國家思想」之出發點。相關部份列入次章討論。

叁、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體系

如本文開端所述，史賓格勒不僅是位歷史哲學及文化哲學的大師，而且亦為政治思想家。吾人欲研究史賓格勒的政治觀，則宜先瞭解那些使其產生和成形的背景因素。就此問題可分別自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兩方面來觀察。所謂主客觀因素即意指：就史賓格勒當事者而言，所有內在及外在影響史氏政治思想形成之原因。茲探討如後。

註⑩ 參見Oswald Spengler·前揭書，附圖部份，頁七〇～七三。及 BROCKHAUS 百科全書，頁七〇九。

註⑪ 見 BROCKHAUS 百科全書，頁七〇九。

註⑫ 同註⑩。

一、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形成之背景因素

1. 主觀因素

從內部來造成個人思想的主觀因素主要是指人格和本性。史賓格勒具有特立獨行的風格和孤僻封閉的本性。據史氏姪女口述，史氏一生幾乎獨來獨往。鮮與他人結識、接觸、交往，故人際關係極為貧缺，朋友甚寡。在學生時期，史氏並未與其大學教授有較親近之接觸。多少對他起某種影響者係一小羣主張革命論的俄國大學生。然而此種人際關係却因畢業而中止。隨後於慕尼黑開始的自由研究寫作的生涯中，史氏雖曾與少數若干詩人、藝術家及政治和經濟界人物有來往，但絕稱不上知己之交。^⑭

從前述史賓格勒在人際接觸和溝通上的表現大約可推斷史氏的本性：它是屬於內向型、孤僻閉塞的。論及人格方面，據稱史氏生平較執着己意、固持成見，而不輕易接納他見。簡而言之，他擁有較強地以自我意志為中心的人格特徵。史賓格勒的與生俱來的獨特人格及個性導致史氏在內心深處形成一股較偏激、非理性開放式的政治思想。此種思想根本上是以反對自由民主，而崇尚國家權力和統治者權威為導向的。

2. 客觀因素

來自外界而影響個人思想的客觀因素主要係指政治社會的環境。史賓格勒當時所生活的周遭環境正是國家統一、內政鞏固、政府深具權威、行政效率發達、外交地位優越、社會完成改革且軍事力量強大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外界情境。

有「鐵血首相」之稱的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於一八六二年被普魯士王威廉任命為內閣總理兼外交總長後，厲行富國強兵政策。長於運用外交及軍事策略的俾斯麥領導普魯士先後擊敗歐陸強國丹麥 (一八六四年)、奧地利 (一八六六年) 及法國 (一八七〇年)。對外軍事和外交的戰果為俾斯麥積極進行的以普魯士為政治領導中心的德意志統一運動奠定了基礎。一八七一年元月德國終於完成統一。統一之德國號稱「德意志帝國」(das Deutsche Reich)。^⑮ 以普王威廉為德皇。帝國採聯邦制，由廿五邦構成。帝國議會及政府分享中央之立法權和行政權。無疑地，此新德國是俾斯麥鐵血手腕之下的產物，亦是德意志長期割據分裂、否極泰來之結果。^⑯

註⑭ 參閱 Ernst Stutz, 前揭書, 頁二四三~二四四。

註⑮ 一八七一年建立之「德意志帝國」史稱「德意志第二帝國」。「德意志第一帝國」係西元九六一~一八〇六年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第三帝國」指一九三三~一九四五年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亦即納粹德國)。

註⑯ 參閱葉龍彥：西洋全史，第十四冊，頁四二八~四三一。頁五九二~六二一。

史賓格勒生在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政治社會環境中。史氏親身體驗和目睹德國在「俾斯麥時代」（一八七一至一八九〇年）及「威廉二世時代」（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的強盛和榮耀。德國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之所以能國富民強，主因在於：君主權威崇高而行開明之專制，又得良相輔佐治國，至於人民則祇知服從權威之領導、認同君主富國之政策、僅顧念社會國家而不言個人自由。

上述種種的德國政治和社會環境對身歷其境的史賓格勒之政治思想起了相當程度的沖擊。史氏主張「普魯士模式」的強權國家，反對自由放任主義、羣衆民主政治及個人主義。這種政治觀的產生與史氏適時所處的環境確有因果關聯。

內在主觀因素與外在客觀因素雖交互影響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之形成，但由於史氏的自我意念強固，觀念不易被外界改變，故在其思想產生上主觀因素之作用大於客觀因素。

二、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以強權國家之思想為中心

除西方之沒落及決定年兩書外，最足以具體反映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者莫非史氏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六年間出版的政治性論文及演說辭，諸如：「普魯士之特質與社會主義」、「俄羅斯之兩面與德國之東疆問題」、「德意志青年之政治義務」、「世界政治之新形態」、「德意志帝國之新建設」、「當前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之關係」等。

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體系以「強權民族國家」(der nationale Machtstaat) 的理念為中心：具有權威並採行社會主義的普魯士乃史氏所稱的「強權民族國家」之表徵。普魯士國家係所有政治性的組織形態中最理想者。依史氏之見，普魯士的精神及特質與社會主義是同一體的。^⑮「社會主義」在史氏的理解裏，並無馬克思理論中的社會主義的內容，而却意謂著權力。^⑯基於史氏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即權力的觀點，厲行該主義的普魯士非它，而是一典型的強權國家。

在深入探究史賓格勒的強權國家思想之前，宜先提出若干重要的相關概念及史氏對其理解的內容。

1. 史賓格勒理解下的「普魯士特質」、「人民」、「政治」、「權力」、「戰爭」、「社會主義」概念

普魯士特質 (Preußentum)

註⑮ 參閱 Oswald Spengler, *Politische Schriften (Volksausgabe)*, München und Berlin 1934, 頁1011。

註⑯ 同註⑮，頁105。史賓格勒認為：社會主義的勞工羣衆與保守份子相互誤解，且因而錯會社會主義。馬克思理論和階級自我慾應對此負咎。

「普魯士特質」乃一種富生氣活力的感覺、一種天性、一種本能、一種獨有之能力。它是靈魂、精神及肉體本質的總括。諸此本質已成為一種族（即普魯士）的特徵及該種族最優秀、最傑出之典範。¹⁷

人民 (Volk)

人民屬於一種政治形態：一種由人民所創造、被其熱血所融合而成、且足以單獨為其所實現的政治形態。人民僅有被善加統治之權利。因為人民乃羣衆，無經驗和能力來自己行使統治權，故必須由那些被正確選出的少數人來統治。人民之命運非繫之於各種理應如何的意見、論調或決議，而是繫之於那些真正去做且能夠做到必做之事的人。¹⁸

政治 (Politik)

政治非它，而是一種藉精神武器以鬭爭之藝術。政治之目標就是成就。好的意念無法保證成就；成就之保證端賴才能。偉大的政治益加具有一種統治的特色：這種統治係被若干數人在不說明行為理由之下依其主觀所行使的。這些統治者試圖憑藉所有可運用的手段來確保其統治計劃對內的實行。在未來政治的運作中，行使統治的少數人也許存在或不存在。若存在，則彼等將依其主觀意志行動；若不存在，則縱使備有所有的權力手段和合憲的統治形態，一國之命運仍將異常坎坷。¹⁹

權力 (Macht)

權力是絕對的。權力係由自主性之意志轉變而成。它不需任何外在條件或法律上的認可。掌握權力者始終是國家及才能超羣的個人或少數人。²⁰計劃和思想若無權力以實現之，則是罔然的。

戰爭 (Krieg)

戰爭乃較高層次的人類生存之永久形態。國家為戰爭的原因而存在。故國家是備戰的表達。世界史即是諸國家之歷史；各國之歷史即戰爭史。²¹

註¹⁷ Oswald Spengler, 前揭書, 頁一九~三〇。

註¹⁸ 同註¹⁷, 頁五六、二〇九及二一四。

註¹⁹ 同註¹⁸, 頁一五一、一八二、一八三。

註²⁰ 參閱 Ernst Stutz, 前揭書, 頁一〇〇。

註²¹ 參閱 Oswald Spengler, 前揭書, 頁五五。

社會主義 (Socialismus)

社會主義是人類的秩序。該秩序建立於權威的基礎之上；並透過立法手續來達成其目標。②社會主義思想最深一層之含義就是追求權力之意志、不為個人而為整體利益之鬭爭。③

2. 革命中權力之基本問題

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既以「強權國家」的理念為中心，則權力的根本問題在史氏的思想體系中自然具重要之地位。首先探討革命中權力之面向。此處所謂之「革命」係指近代發生於英國、法國及德國的革命運動而言。

在革命與權力的關聯上，史賓格勒認為，古代之革命僅試圖達成可能生存的根本目的；然而自十八世紀以來在西方發生的三大革命運動④却反映出權力的基本問題。依史氏之看法，革命中權力之問題以「個人和整體意志的隸屬關係」為焦點，具體言之即：是否個人意志隸屬（或臣服）於整體意志之下？⑤該問題尤其呈顯於當革命展開、個人意志與整體意志相互競爭而須抉擇之際。

史氏基於其歷史及政治觀而分別比較英、法、德國革命中的權力現象。他認定，政治權力的掌持者各依各民族之天性和本能（即特質）而有所不同。一民族之特質在與權力的關聯中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史氏就英、法、德相關方面做比較如左：

英吉利民族之特質決定了其權力屬於個體、非屬整體。於某個體對抗其他個體的任意性的鬭爭中，強者贏得勝利。此正為英人之自由主義思想。如此國家不復存在。依英人之見，若每個人為自己而鬭爭，則最終對所有人皆有益。

法蘭西民族之特質決定了其權力不屬於任何一方。它無所謂隸屬的問題。簡而言之，無國家、亦無秩序。此即理想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綜論之，英法兩國皆有民主政治的思想，但彼等對民主的含義理解却大異其趣。⑥

德意志——精確言即普魯士——民族的特質決定了其權力屬於整體。個體為整體服務。整體是最高權力的掌持者。德國之革

註② 同註②，頁四六。

註③ 同註②，頁四三。

註④ 史賓格勒在其相關的政治性論著中並未具體詳述「三大革命」發生的時間及名稱，故料指英、法、德三國的革命性政治過程及其動向。

註⑤ 參閱Oswald Spengler，前揭書，頁一四一～一五。

註⑥ 同註②，頁一五。

命運動係發自此種理念。至於國君（意指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僅是國家排行第一的役者（服務者）而已。人人皆獲其職位，並服從國家法令。這就是自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的權威性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與英人的自由主義和法人的民主思想對比下，本質上是反自由、反民主的。^②

吾人從上述史賓格勒對英、法、德三個民族有關權力屬性的比較中可得兩點認知：（一）德意志民族的特質與英法民族性有顯著差異；後者崇尚個人主義的自由放任；前者講求整體至上及個體服從的原則。（二）德人的權力觀與英人及法人的權力觀不同：德人將個體追求權力的意志無條件地置於整體意志之下。最高權力歸於整體（即國家）所有；英、法民族則反之。值得重視者，史氏的權力歸屬論已簡明地表達了他的「強權國家」的中心思想。

3. 普魯士之國家思想——普魯士之社會主義

史賓格勒的強權國家思想因他所提出的「普魯士之社會主義」論點而具體化。此處擬祇探討普魯士社會主義的政治面向上。先論史氏所稱之「普魯士風格」。「普魯士風格」可理解為為公服職、服務或服役之精神。本此精神，並無個體「小我」而祇有整體「大我」。「大我」乃彼此共同一體之感覺。基此感覺，每個小我傾全力以赴，為大我而犧牲奉獻。^③大我就是國家社會；小我即個人。個人為國家服務，並必須無條件地犧牲自己。在國家社會裏，大我的共識發揮主宰行為之作用。

史氏認為，普魯士風格培育出了一股強烈且深遠的「職級意識」(Standeshewußsein)。「職級意識」是一種共識，非安逸享樂之共識，而是勤工苦幹之共識。「階級」係職業性的共同體，它具備為整體、為國家社會服職的意識。史氏所稱之階級主要指軍官、官吏及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④

普魯士民族視工作和服務為神訂之戒律。工作本身是職業倫理上充滿價值之事。在社會生活中，個人的幸福、安逸和成就無關緊要；重要者乃職業活動。各階級的職業活動亦屬一種必盡之義務。這便是史氏觀點中的「普魯士社會主義之倫理」。

除上述以外，普魯士風格還與一種專屬偉人的「內在獨立自主性」密切地結合成一體。史氏深信，負有義務的社會體系能為具有遠大思想的人確保其內在心灵的獨立自主性。這種內在自主性與那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祇享權利而不盡義務的社會體系（如英國社會）是絕然對立的。^⑤史氏推崇當年完成德意志統一的大功臣——莫特克（Moltke）將領。他說：「內在自主性如莫

註① 同註②。

註② 同註①，頁三二。

註③ 同註②，頁三七。

註④ 同註③，頁三九。

特克者在英國是無法想見的。」由此暴露出史氏對英人之輕視。

其次再論與普魯士之風格密結的「社會主義」。如前所述，史賓格勒的社會主義思想之精義在於追求國家整體權力的「意識論」以及為整體福祉而犧牲奮鬥的「鬭爭論」。在史氏的心目中，第一位有意識的社會主義鬭士並非馬克思(Karl Marx)，而是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一七一三—一七四〇年)。^④普魯士在威廉一世領導下真正成爲一勤工苦幹的勞動者之國。其目標大別於英國，不在於個人私有財產的自由累積，而在於統治之貫徹和權力威信之樹立。^⑤在這個史氏認定的「真正國家」裏，嚴格而論並沒有所謂的「私人」存在，祇有在此良好運作的有機體內扮演零件角色的「勞動個體」。至於國家的官署，則由一羣有責任感的官吏或公務員所構成。彼等各有其位、各掌其職，一秉爲公服務之忠誠。^⑥官吏一本爲國奉獻和盡忠職守的原則，依史氏觀之，此一表現正是普魯士社會主義精神之發揚。

在普魯士社會主義的強權國家思想架構下，史賓格勒又提出了「團隊思想」之觀念。「團隊思想」(Ordensgedanke)的中心意旨即「整體爲了整體」、亦即一種共同感覺和大我共識之建立。團隊思想內容的原則是：依團隊中每位成員個體的實際心智能力來賦予其適度的命令及服從的職責。每人的職責程度和等級任何時候皆可調整。這種被史氏視爲典型普魯士思想的團隊理念乃建立在選拔人才、共同負責及合作共事的原則上。^⑦

史賓格勒還論及「社會主義君主國」的信念。史氏確信，具權威性的社會主義祇能在君主國體下建立和鞏固起來；在共和國體下欲實現它是不可能之事。憑此信念，史氏盛讚普魯士的君主國體，堅決反對並敵視一九一九年德國建立的「威瑪共和國」(die Weimarer Republik)，及其議會政治和民主政黨。^⑧如他所譏諷之言，威瑪共和國根本不是一個國體，而僅是個談交易買賣的「公司」。至於威瑪的國會，則被貶爲毫無作爲、無決議的生意商洽之場所。就「社會主義君主國」而論，史氏表示它正是一個完整的單位。在此單位內每個人按其社會之職級、天資、組織能力、工作能力、忠貞篤實性、幹勁及大我之共識程度而適得其所。^⑨

註④ 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係腓特烈一世之子，統治普魯士達二十三年。威廉一世與其父不同，是位簡樸、冷靜、嚴謹及節儉的國君。於他統治期間，行政效率高、官吏清廉忠誠、財庫充裕，堪稱賢君。

註⑤ 見Oswald Spengler, 前揭書, 頁四八。

註⑥ 同註⑤, 頁六三。

註⑦ 同註⑤, 頁六四。

註⑧ 有關史氏批判「威瑪共和國」國體及其議會政治方面可詳見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1968, 1978, 頁一四七—一四八。

註⑨ 見Oswald Spengler, 前揭書, 頁七〇。

令人矚目者是這位近代德國歷史文化哲學家所稱的「普魯士之民主政治」。「普魯士之民主政治」不意指如英國式私人自由放任的政治，而意指以國家整體意志為主導、有大我自由而無小我自由的政治模式。^⑦故史氏政治思想中的「普魯士之民主政治」概念，就含義和精神而言，實不可與英法及美國之民主政治一視同仁。

綜合前述吾人認知：史賓格勒所代表的「普魯士社會主義」理念是他政治思想體系中強權國家思想的具體形式。以服務奉獻國家之精神為根本的「普魯士風格」及以「團隊思想」和「君主國」信念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是「普魯士社會主義」之主要內含。「普魯士特質」與「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面；兩者之結合形成了史氏強權國家思想的架構。

4. 偉人全權統治之思想與未來政治統治之形態

政治應由雄才偉略的政治人物來全權主持和領導是史賓格勒政治思想的重要面向之一。此種偉人全權統治的理念明白地呈顯於史氏在一九二四年所撰的談德意志青年之政治義務一文中。

在偉人全權統治的思想前提之下，史賓格勒首先論及「統治之藝術」。史氏認為，統治之藝術並非排行居首的問題，而是偉大的政治的唯一問題。所有其它種種皆因隨統治術而來。故此種藝術創造了世界的歷史。史氏確認，統治術之認知和瞭解對肩負政治重任與義務的德意志青年而言實具有最重大和關鍵性的意義。德國青年終究必須嚴謹和冷靜地正視統治術之含義。^⑧依史氏之理解，統治術乃一種與生俱來或長期自身培養而得的運用權力及行使統治之能力。此一能力是絕對的，非常的，稀罕的。

史氏不把一國有無一部憲法，而將一國是否有確保其安全生存的鬭爭意志視為對該國前途最具決定性者。而國家生存的先決條件正在於運用權力、行使統治之卓越能力——統治術。在此關聯中產生的另一個相關問題是：誰具備行使權力、治理國家之卓越能力？針對這問題史賓格勒認為，有領導統御天才、關切民族命運、並發自內心欲肩負治國重任的偉大人物即具備統治之能力。如此偉人或許祇是一人，或者是一羣少數人。彼等必須是國家統治權的操持者，因為唯有彼等始可憑藉其高超之治國平天下能力、在行使統治的全權之下將國家政事治理妥當，進而確保國家的生存和強盛。在史氏心目裏，腓特烈·威廉一世、俾斯麥、莫特克諸輩是典型的統治奇才和歷史偉人。^⑨

基於偉人全權統治的理念，史賓格勒曾從他當時的角度對未來（即一九三〇、四〇年代以後）德國的政治統治形態做了番構

註⑦ 同註⑥，頁一〇五。

註⑧ 同註⑦，頁一四三。

註⑨ 同註⑧，頁一四三～一四五。

想和預估。析述史氏對未來德國政治前途的想像亦有助於吾人進一步瞭解他「強權國家」思想的旨趣。茲扼要敘述如左：

未來德國的政治統治形態由三方面因素所決定：(一)時間、(二)德國地緣政治之情勢、(三)德意志人民之特色。^④具體的統治形態如下：

政府權力特別強大，且政府有高度責任感。然它與議會制的政府絕然有別。政府定期提出施政報告，再交人民代表接受或否決。不是施政計畫而是其成果將受到批評和監督。總理（或首相）被委以全權，依己意選擇內閣各部部长，並組織政府和官署。部長及官署首長在人事和組織的範圍內亦被總理酌情委以全權。部長們唯獨對總理負責。總理應依自己自由之判斷召集一私下秘密的「國務會議」（Staatsrat）。此會議組織網羅政治和經濟方面所有大小範疇的人才及專家。「國務會議」的功能不在於議決，而在於諮詢。若得正確發揮其功能，則此會議將可成爲培育青年才俊的高等學府。該組織專隸屬總理，而與憲法無任何關係。

「帝國議會」乃透過普選而產生，它係民意的表達者、政府的監督者，每年集會兩次，會期緊湊。「帝國議會」之功能在聽取政府施政報告、評議時政得失，並循記名投票方式同意或否決預算案及法律案。議會對人民負責。^⑤

政府必須隨時有權力透過選舉來要求人民對其民意代表下判決。^⑥

從上述史賓格勒對德國政治統治形態的展望觀之，吾人可說這位歷史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頗有遠大的理想和獨道的見解。至少他設計出了一套理想型的政治統治模式，做爲德國政治發展的遠景。這對當代的德人而言，相當具有啓示性。至於史氏所構想的模式，根本上，始終是以「強權國家」思想及其衍生的「偉人全權統治」理念爲基礎。

肆、結論——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對德國政治及社會之影響

如在本文前言部份所指出者，思想產生於某特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條件之下；而思想發揮某種作用後又將對政治和社會局面造成相當之影響。此處欲以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對近代和現代德國政治社會之影響做爲本文結尾部份研討之焦點。

吾人誠然不宜過份高估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如何重大和深遠地影響了德國的社會，畢竟史氏祇是一位在德國政治思想領域中不十分特出而知名度亦不甚突顯的學者而已。然而，史氏的政治觀——尤其是強權國家思想——在與當代其他類似的思想方向相

註④ 同註③，頁二〇九。

註⑤ 同註④，頁二〇一～二一一。

互呼應之下，對當時及後世之德人仍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和迴響。茲分點討論於下：

一、反自由民主潮流之形成：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如前所述，極力主張國家整體自由、君主國體、偉人或少數人全權統治、職級意識、個體無條件為大我犧牲奉獻、服從命令、克盡義務職守、忠誠謀國等；是故他堅決反對西方（尤指美英法）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全民主政治（人民統治）、議會政體、權利義務對等論。史氏這種根本上反自由民主的思想與當時為數頗衆的其他思想家的論點不謀而合：譬如莫勒(Moeller)的「第三帝國」思想、史邦(Spann)的「真理之國」理論、尤鏞(Jung)的「少數統治」觀念、葛朗赫(Kranthal)的「有機世界」主張以及史密特(Schmitt)的「反議會制度」和「政治之概念」思想等。彼等相互呼應、聲氣相通，竟形成一股知識份子反自由民主的思潮。這股在當時德國社會中日益磅礴的思潮公然與既存的「威瑪共和國」的議會民主體制對抗。普遍德人在受反自由民主思想宣傳的感染下，逐漸失去其對民主共和精神的認同。原本象徵理性、自由和平等的「威瑪」政治，在德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却淪為政治上無能、無為、頹廢和腐敗的表徵。威瑪共和國變質為一個所謂「無共和國信徒的共和國」。持續短暫的十四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統治期之後，威瑪共和國——德意志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終於在飽經反自由民主思潮的沖擊下，蒙遭崩潰解體之厄運。代「威瑪」而起者，却非史賓格勒所預言的普魯士社會主義式之強權國，而是以獨裁者希特勒為唯一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之德國。史賓格勒在晚年時曾表示，國家社會主義之運動是沒有希望的。

二、德國民族意識之激勵：史賓格勒的「強權民族國家」理念及由此衍生的「權力意志論」和「生存鬭爭論」無形中激發起大多數德國人民——尤其德國年輕一代——的民族意識及愛國情操。史氏一再強調普魯士遠勝英法民族的優越之處，致使德人確信，德意志民族是最優秀、德意志文化也是最燦爛的。此外，史氏的絕對服從、負責、無條件為國為公犧牲奉獻、嚴守紀律、團隊精神等觀念實有助於德人的國家至上、民族至高的信念。所不幸者，此種因強權國家思想而激發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却被有猖狂野心的希特勒及其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黨」誤導並利用為奪取政權、建立納粹帝國，對內一黨獨裁、對外武裝侵略的思想工具。德國人民在受非理性、近乎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思想浸潤之餘，錯誤地確信希特勒軍國主義和獨裁政治的目標即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真正實現。故德人無條件地服膺希氏之領導，為此獨裁者效命犧牲。

從以上兩點看來，史賓格勒的政治思想和國家理念似乎對近代德國政治社會的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但吾人若從另一角度觀察，即從當今德國人民絕大多數工作態度勤奮嚴謹、服從國家法令、嚴守團體紀律、生活簡樸等方面論之，則可下個中肯的結論：史賓格勒的思想對現代德國社會實具有正面的影響力。

（本文作者現為政大政治學系副教授）